

## 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刘君君(土家族)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俗和文化,但同时都有着统一的身份认同,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相互团结、共同奋斗,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向前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会表达出人民在创造美好新生活过程中的集体风貌。各个民族的作家在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将个体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都融合进文学创作中,并最终指向国家认同。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成为多民族作家们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

### “多元一体”植根于各民族的互动互融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多元一体的结构。学者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做‘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汇聚融合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进入近现代之后,面对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组成抵御外敌的统一战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由此前“自然”、“自在”的状态转为“自为”、“自觉”的状态,全国人民的心气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想象的产物,而是根植于历史、文化与血脉,有着浓厚的传统。在现代文学阶段,一大批优秀作家积极用自己的笔墨书写全国人民的团结抗争史。老舍、萧乾、端木蕻良等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也都写有相关主题的作品。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集合,论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民都欣喜于新政权的确立、新权利的获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之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笔下,经常涌现出来的是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奋斗的场景。党和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70余年来,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虽然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有些不同步、不平衡,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宗旨从未改变,始终追求“发展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得益



在21世纪已走过20年的当下,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壮族文学历程,探讨新世纪20年来壮族文学的新发展,对壮族文学发展史来说意义重大。容本镇、张淑云等著的《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作者申报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的最终成果。这一研究成果,无疑是壮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为当代壮族文学的发展和壮族作家的培育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样本。

容本镇作为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始终关注着广西文艺评论的发展,特别是在壮族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不遗余力。新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格局的呈现,壮族文学的发展也显现出许多新的特质。进入21世纪,壮族文学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在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国内外市场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冲击下,文学被边缘化的说法在舆论界此起彼伏,壮族作家面临新的抉择和转型。怎样转换身份、转变审美、超越地域、书写民族、拓展文学发展空间,是新世纪壮族文学的时代课题。这也促使容本镇重点关注新世纪以来的壮族文学的发展,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一项重点课题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研究。

《壮族文学二十年》正是从新世纪的壮族文学转型发展入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文学地理学为理论支撑,在作家文化身份、文学审美精神、地理空间等诸与文学相关联的语境中,再现和还原了20世纪壮族文学的发展,深入探讨新世纪壮族文学在广西乃至中国文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气度、风格与特征。

20世纪的壮族文学经历了从近代文学过渡到现代文学的阶段,新文学脱胎于旧有的民间文学。在这个阶段诞生的一批新式文人群体或新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文艺思想,运用新的文学形式,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需要,崛起并逐渐走向专业化创作的轨道。《壮族文学二十年》在对20

于党的坚强领导,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得以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近些年来,脱贫攻坚实践,极大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大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极大增强了大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文学领域,作家们积极书写人民奋进过程中的每一个脚印,为时代树碑、为人民塑像、为民族立传,在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表达中彰显了人民的精神风貌。

###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

由于旧中国与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差异,新旧中国的文学书写各有不同。旧中国由于夷夏之辨的存在,一些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一些民族文化被视为落后、半文明的文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备受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诸多少数民族身份被识别、公开,少数民族作家受到极大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

萧乾在《萧乾选集》自序《遥远的祝福》中写到1949年之前的民族身份问题:“好在那时不大填表,填也轻易不问‘民族’。偶尔遇到非填不可的时候,我为了怕受歧视,干脆只填个‘汉’字。”可是1949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少数民族不但受歧视,还特别吃香哩”。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前未公开自己的族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公开说明自己是满族。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时,对此颇有感慨:“我在解放前的确没有听到过语言学家罗常培、文学家老舍是满族,他们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开民族成分的。当然,我们这些汉人和他们相处时并不会感到我们之间有什么民族差别。在没有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之前,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满族。”这些作家始终深爱着自己的民族,但到了新中国,由于平等的民族政策,再加上民族身份的确认等因素,他们的民族身份才被公开,民族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

伴随着党和国家平等民族政策的推行,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神话、史诗、传说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在文人创作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井喷而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书写本民族的故事,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例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以诗意的笔调把环境、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茫茫的草原》等作品显得格外清新、明朗、质朴,散发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自画像》中用排比、回环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个从大凉山生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形象:“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在《西藏,隐秘岁月》等小说中展现了西藏社会的变迁,表现西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还有很多的作家、诗人,随着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断书写带有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认同感的作品,创作了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

当然,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是和家认同结合在一起的。56个民族56朵花,大家都生长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花园里,都以各自的特色展现花意的盎然。具体到文学创作上,作家们一方面关注本民族的问题,同时又将此一民族问题放到全国的大格局中进行考量,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融合视野。那些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全国典型性的题材、命题,最为得到作家们的关注。比如前面提到的脱贫攻坚题材写作,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样本,但都属于全国一盘棋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再就整个文学领域而言,每个民族、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题材、风格,但都是中国文学这个大集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 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从借鉴走向融合

各民族文学之间在题材、体裁、人物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借鉴,是源远流长的。我国流传的民间史诗、传说,存在很多相似的源头、原型,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互相融合的。各个民族的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们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创造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财富和不可缺失的一环。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也体现了从相互借鉴到相互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一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受教育水平,与汉族青年作家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二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网络世界,而且这个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互缠绕的关系。因此,作家们不会因为地理(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产生思想、意识、观念上的过多差异,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相似的语境和命题。而且,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频繁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之间,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区别似乎不再那么大。现在读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它们不再聚焦民族意象,而是关注一个共同的网络世界,而且这个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互缠绕的关系。因此,作家们不会因为地理(生活环境)的差异,而产生思想、意识、观念上的过多差异,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相似的语境和命题。而且,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频繁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作者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教师)

诗歌是人类纯粹精神追求的产物,因而,几千年来,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综观当下中国诗歌,在“及物”观念和写实思潮的影响下,对“叙事化”一边倒地“追捧”,对抒情性的重视和探索却“知音稀少”。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中国诗歌的“正道”出路,而长此以往,将会把中国诗歌引入死胡同。

我觉得,中国新诗百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探索进程之中,并没有真正地走向成熟。就拿抒情化和叙事化来说,过去是抒情化的天下,现在是叙事化的时代。在我看来,叙事化固然有利于回避“假大空”,回避空洞和滥情,但是,一旦叙事化泛滥以后也成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诗歌缺失了“精神性”和“神性”。诗歌的首要任务是表情达意,表现人的精神感受,所以完全离开了精神性(升华一点就是神性),那怎么行呢?诗歌写作应该带有一点精神性,否则一味地“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追求干巴巴的叙事,我认为不仅没有回归诗歌的本真性,反而是把诗歌拖向了“僵尸化”。诗歌应该是有情感温度的。这个“情感温度”,不一定非要在诗歌文本里“抒情”出来,但是创作者绝对要“有情”,创作时他的内心一定要有情感温度。诗歌之“美”,包括了文字之美、韵律之美、思想之美等多个方面。所以,中国新诗叙事化追求,不应该只是简单化的叙事,同时应该注意内在的抒情。

有学者这样给叙事诗下定义:“叙事诗的内容本质是抒情性。离开这一点,叙事诗的内容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叙事诗当然要有情,要合宜地处理好情与事的关系,要在抒情中叙事,叙事中抒情,具有分明的抒情气质。“叙事诗的抒情性表现为它以诗的抒情原则统驭叙事而不是相反。”这些观点试图表明,即使是“叙事诗”,也应当包含一定的抒情性。可是,你看当下的一些诗人,他们还在对“叙事”和“抒情”采用一定的平衡术吗?他们玩的似乎只是“叙事”了,比的只是谁的叙事技术和手段要高明一些,至于抒情,对不起,那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甚至有人认为,抒情是陈旧、老套、过时的传统写法,是不及物的、凌空蹈虚的。可是,他们忘记了,离开“抒情”,叙事诗就会同其他不是诗的叙事作品划不清界限。难怪现在说到诗歌,有人会说:“诗歌嘛,就是分行文字。把随便一段话拿来用回车键分一下行就是诗了!”

对抒情的忽视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完全舍弃了诗歌的抒情性。事实上,还是有不少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极其浓厚的抒情色彩。另外,还有很多诗人,他们虽然也在自觉地向诗歌的叙事化靠拢,但是始终把抒情性作为诗歌的底色和基座。诗人安琪就对笔者坦言,她曾经写作过一段口语诗,“发现不行,自己还是比较擅长抒情诗,所以又回到了抒情的路子”。她说:“口语的现场感就有叙事的元素,就是截取生活的某件事入诗,但中间还得有巧妙的迂回,如果不是单纯把事情用口语形式写成诗,就显得浅白。我在迂回上不擅长,总觉得浅白了。”安琪的这段话,表明了“叙事”的难度,简单直白的罗列不是真正的“叙事”。当然,这也不是说“抒情”就比“叙事”容易,关键是适合诗人自己,而且两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在题目里标明是“抒情”,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也是现代诗人不乐于见到的“大抒情”的“抒情”,而是在叙事化中达到叙事与抒情间的水乳交融。同时,它们也不是被我辈所诟病的干巴巴的“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是在叙事的形式下,带着情感的温度,并且保持了诗歌的思想和语言追求,也保持了诗歌精神和诗歌的尊严。这些作品是及物的诗歌,又是从及物中升华至不及物之境,是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物”“神”俱备的好诗作。这些可贵,为抒情与叙事的融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也乐于见到类似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处理时代的大题材,成为真正的时代性佳作。

## 片面追捧「叙事」而忽略「抒情」要不得

□沙辉(彝族)



## 壮族文学的坚守与展望

——评《壮族文学二十年》

□钟世华



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进取。以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主体的壮族作家也在悄然崛起,为广西文坛及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陶丽群、李明媚、许雪萍、潘小楼、韦静波、梁志玲、黄芳、罗南、覃秋林、廖莲婷、刘永娟等一批壮族女作家的创作令人刮目相看,她们充分发挥女作家自身的写作优势,同时结合社会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时代大潮,把关注女性命运与探讨社会发展相结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这些作家构成新世纪壮族文学创作队伍鲜活的生命力,《壮族文学二十年》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与深入地挖掘。他们在家乡完成或开启了对异乡的梦想,又在异乡强烈地怀念着故乡故土,絮絮不停地讲述着家乡的故事。这种与本民族文化血脉和精神传统无法割舍的情感与情结,成为壮族作家开放意识的催化剂和创作转型的驱动力。

《壮族文学二十年》为壮族文学研究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作者在研究新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过程中,注重多角度全方位地构建新世纪壮族文学的风貌,通过对作家创作文本的挖掘,全面而清晰地展现出2000年以来壮族作家的创作历程。著作总结了壮族文学创作在新世纪表现出的转型特征:主体身份的转换、审美精神的嬗变、地理空间的扩大、创作体裁的拓展。书中这样描述这一转型:“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

的持续深化,壮族文学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过去所强调的‘民族性’不再作为壮族作家所唯一或重点关心的方面。他们热爱和关注着本民族的同时,也以广博的胸襟和开放姿态,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世界,他们视自己的民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创作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突破,可以说是壮族作家‘文学当随时代’的结果。他们从传统少数民族题材,转向底层叙事与边缘关注,尤其是关切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命运、不同文化碰撞时的心理与情感,交织着感伤与希望、残酷与温情、失落与憧憬。壮族作家们表现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带有明显的转型指向。”正是壮族文学所具有的这样独特的转型特征,突显了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价值所在。

《壮族文学二十年》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是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新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壮族作家的地理分布、西部地理景观对壮族文学的影响、多民族人口地理与壮族文学的多元性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壮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从跨文化、跨族际、跨地域三个向度探讨壮族文学在新世纪所实现的深刻的转型。研究视野宏阔与细微兼得,既有对文学地理学理论兴起与发展的梳理,也有对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作品的个案研究。从理论探讨到个案研究,描画出一幅新世纪壮族文学

发展景观,为壮族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展现了壮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批评实绩。

可以说,“文学地理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视域研究壮族文学,《壮族文学二十年》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身,还表现出地理学研究的文学文本转向,从而开掘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价值,进一步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这部著作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回顾和总结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的成就,分析和探讨其发展轨迹,对推动壮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与启示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壮族文学在新的世纪里出现转型,成功与否、成效如何,值得我们去梳理,这对推动今后的民族文学创作、促进多民族文学发展繁荣,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基于新时代的文化语境,这部著作既考察了壮族作家创作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又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朝向当下的新时代语境精准分析了壮族文学创作的转型特征。当代壮族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成为文坛一抹亮丽的风景线。在《壮族文学二十年》中,作者用详细的案例进行分析,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新世纪壮族文学在当下语境下的复杂性,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壮族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

《壮族文学二十年》正视壮族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努力探索突破发展瓶颈的路径,对壮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即实现新世纪壮族文学的转型发展,必须在“坚守”中“创新”:坚守壮乡故土,创新文学品格;坚守民族传统,创新表现内容;坚守人文精神,创新表现形式;坚守现实生活,创新创作观念;坚守资源优势,创新文学机制。这不仅对研究当代壮族文学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当下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以及多民族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作家的培育提供了一条路径。